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4期（民國103年6月），217-2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Harold M. Tanner, *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 Siping, 194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xv+266pp.

汪朝光*

對於東北在 1945 至 1949 年的國共內戰及最後中共勝利中發生的關鍵作用，當事雙方早有所論，學界也有基本的共識，植基於此之研究亦不少。不過，目前研究關注戰後東北政治、外交大局者居多，個案研究，尤其是有關國共在東北軍事爭奪的研究，仍嫌不足。四平，這個在國共之間發生過四次攻防戰，而且其中二次戰鬥堪稱空前慘烈的城市，似乎也未獲得研究者更多的青睞，反顯得有些寂寥。有關四平之戰的研究，甚至都曾是令海峽兩岸研究者有點尷尬的主題。究其因，在中共方面，雖然這是毛澤東的決策，但在當時卻是敗仗，而且是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屈指可數的重大失利之一，再加上戰役實際指揮者林彪的「負面」形象及當時複雜糾葛的種種情勢，使得有關研究實在是難以下筆。在國民黨方面，雖然當時打了勝仗，可是四平之戰後，在馬歇爾干預下的東北停火，卻被認爲是導致國民黨在東北乃至全國最後失敗的關鍵因素，那麼蔣介石對此究應負何種責任及其得失便也不宜深論。故此，專論四平之戰的著作由美國學者譚納德（Harold M. Tanner）寫成，倒也頗有寓意。

《東北之戰和中國命運：1946 年的四平》一書共計八章：一、1946 年的四平：決定性戰役或失去的機會？；二、東北棋盤，1945 年 8 至 9 月；三、共產黨撤退，1945 年 10 至 12 月；四、馬歇爾使命，1945 年 12 月至 1946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3 月；五、第二次四平戰役，第一階段——從外部防禦到僵局，1946 年 3 至 4 月；六、第二次四平戰役，第二階段——從防守到退卻，1946 年 4 至 5 月；七、追逐與停火，1946 年 5 至 6 月；八、過去與未來的視見。

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譚納德的著作徵引了大量有關四平之戰的史料，包括檔案史料和地方報紙，如國史館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蔣介石日記〉、《蔣中正總統事略稿本》等，以及中共出版的《東北日報》、《牡丹江日報》和國民黨出版的瀋陽《前進報》、《新報》等；有些史料在過往研究中運用較少，可見作者在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有意思的是，作者徵引的中文史料，大陸方面以各種編輯出版的史料集為主，反映出檔案的開放仍有可議之處；台灣方面則以檔案館館藏史料為主，反映出史料的編輯出版仍待加強。由一本英文著作而反映出的中文史料運用差異及其各自優長，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兩岸學術研究所面對的不同環境。惟在史料運用方面，譚著的明顯不足是幾乎未使用俄文一手史料，蘇聯對於東北國共之爭具有重要的影響，缺乏俄文史料，這方面的研究深度不免受限。其實這弱點也不僅見於譚著，海峽兩岸的相關研究運用俄文史料的比例也不高，這方面或可寄望於未來的青年學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譚著不僅徵引了大量中文史料，而且引用的中文論著數量也超過了英文論著，這或是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中出現的一新趨向，即不僅將中文史料作為基礎史料來運用，而且將中文論著提出的看法以一家之言來看待。實話實說，過往的美國學術研究在美國的優勢實力地位支撐下，常有居高臨下之態，對待其他國家學者尤其是非英語論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作為資料而非研究來看待，學術研究的國際化或全球化，往往也就因勢乘便成了美國化。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迅速發展，「中國因素」已然成為各行各業都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有關中國歷史研究的中文論著因此更加得到美國學者的重視，不僅反映出學術研究的一般發展趨勢，也反映出學術研究其實也難免受到一些非學術因素的作用。不過，大陸學者鄧野在《民國的政治邏輯》和《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等論著中有關東北問題的論述，有其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例如，

他認爲四平決戰是國共雙方通過局部性的軍事決戰方式，而體現全局性的政治決戰意圖；譚著中未見引用，不能不說是個缺憾。

四平戰役能夠吸引研究者的最大魅力，在於其具有對於國共東北爭奪的「決定性」意義。一如美國學術研究的常見範式，譚著開宗明義，點出關於「決定性戰役」的迷思。什麼是決定性戰役？我們如何估量及如何認知其決定性？進而可追問，眞有所謂「決定性戰役」嗎？作者進一步論述，如果存在所謂的「決定性戰役」，則又牽涉到歷史中的「假設」問題：是否能以史爲鑒，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利未來。雖然這樣的論述方式迎合大眾流行品味，也爲一般業餘讀者所喜好，但對於專業史家而言卻有些困擾；因爲歷史並非如此簡單明瞭，在歷史的實際進程中，誰作出什麼決定，爲什麼他們作出這樣的決定，他們可能作出什麼不一樣的決定等等，都需要職業史家還原歷史的現場，結合歷史的演進背景，進行縝密而細緻的考察。作者自承，希望以平衡的研究立場，從政治、軍事、歷史的更廣闊空間，回答歷史「爲什麼」如此的問題。（第 1 章）

如同書名所言，本書中心問題是戰後東北的國共爭奪與中國的命運走向，而以四平戰役爲其討論的中心，尤其是 1946 年的第二次四平之戰，最具全面性意義，也是其關注的重點。不過，四平戰役的意義，對於國共雙方而言，究其實仍有不小的區別。對國民黨而言，拿下四平固然意味著打開進軍北滿，乃至控制全東北的大門；但是，國民黨是執政黨，需要面對許多全域性的問題。比如，是先控制關內（尤其是華北）還是先控制東北？如果是先控制東北，在軍事擊敗中共之外，是否還有外交接收的可能？因此，拿下四平只是諸多選項之一，未必需要全力以赴。對於中共而言，奪取東北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的關鍵手筆，所以，堅守四平以利爭奪東北，並有利於和國民黨爭奪全國，更爲中共所看重，爲毛澤東所堅持。儘管對中共而言，過去適應的是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方式，堅守並防禦城市對其是新的挑戰。而且，此前中共在山海關防禦作戰失利的教訓，已經表明中共部隊當時還沒有防守要點的作戰經驗；但是，政治決定軍事，毛澤東更重視堅守四平的戰略和政治意義，所以，這更是

毛所冀望的「決定性戰役」。（第 1、2 章）

歷史進程往往取決於對立雙方的互動。蔣介石對於四平之戰可能起初並不那麼重視，但是中共的堅守，卻刺激了蔣拿下四平的決心。而拿下四平之後，貌似可以勢如破竹的向北進軍，又由於馬歇爾的干涉而中途停止。因此，四平之戰的意義此後便被蔣解讀爲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決戰，惜因馬歇爾的干涉，導致此「決定性戰役」反轉成了「失去的機會」。耐人尋味的是，當時將四平之戰視爲「決定性戰役」的毛澤東，之後並未對此發表更多言論，其看法也沒有在大陸學界得到應有的呼應；而蔣介石對四平之戰的事後評論，有些強作解人之意味，但在台灣學界卻曾得到不少的迴響。歷史事實與歷史評價之間的關係實在難以一概而論。如譚著所論，那些認爲馬歇爾逼迫蔣介石下停火令而浪擲了收復全東北機會的論點，實際是落在假設上。爲了論證這假設，便需要回答一系列問題：在中共方面，林彪失敗的程度是多少？中共有多少傷亡？他們是否能夠承受國民黨的繼續進攻？在國民黨方面，杜聿明的追擊是否有其他路徑？即便有，國民黨眞能夠完全打敗共產黨並佔領全東北？爲什麼蔣介石同意停火？馬歇爾、蘇聯和關內外形勢在什麼方式上影響蔣的停火決定？對於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回答，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說法也不完全一樣。學者能做的只是小心檢視所有的資料，並嘗試對其進行統合性研究。（第 7 章）

譚著的篇幅並不長，對四平戰役的論述，更多是集中在中共方面；如果從前述四平戰役於國共的不同意義而言，如此的偏重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對於四平戰役的指揮、組織和領導，除了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在重慶的周恩來之外，主要集中於東北的軍事領導人林彪和政治領導人彭眞。在分析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四平戰役中作用的同時，譚著也用了一定篇幅討論林彪和彭眞的作用，尤其是他們的分歧。

林彪和彭眞在中共爭奪東北包括四平之戰中的作用，在中國大陸是個有爭議且不無敏感的問題，而且因爲過去反覆的政治鬥爭，往往又誇大了這樣的爭

議和敏感。平心而論，林彪和彭眞各有各的歷史背景和革命經驗，在中共爭奪東北的過程中各有各的貢獻，他們之間的矛盾分歧也未必是根本性的，或許只是來自於他們所處的不同地位和面對的不同問題而已。作爲東北局的領導，彭眞需要面對政治、組織、城市、農村等各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與東北蘇軍當局打交道，決策牽扯較多，較易引起爭議。而作爲軍隊的領導，林彪首先需要確保打勝仗，目標單一，處事也難免直言盡意。毛澤東對他們其實並無特定的偏向，端視如何確保中共控制東北爲至高目標，故既不乏支持彭也不乏支持林的言論。譚著認爲，關於彭眞和林彪的關係，因爲沒有第一手的檔案資料，甚至沒有比較客觀的第二手記載，六十多年之後，想要準確地理解當時發生了什麼，爲什麼會發生，是非常困難的。對此譚著採平實之論，認爲彭眞盡力做到了最好，尤其是建立了地方政府和黨的組織，他對城市的關注，也與中共中央的戰略變動有關；林彪則具軍事素養，在軍事行動較政治鬥爭更重要的東北戰場，不滿意軍事從屬政治的地位；而彭、林的分歧也與當時東北中共組織的調處不力有關。（第 3、4、5 章）筆者基本認同譚著的分析，但也對其未能在這問題上進一步發掘史料，並作透徹評論分析而稍感遺憾。

譚著對於國民黨的決策論述似有欠缺。例如，書中對於負責戰後東北接收的領導機關東北行營及其主任熊式輝的論述就不多，遠不及對於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的論述，甚至對於蔣介石撤出東北行營的決策措施也未有適當論述；而實際上，熊式輝在東北國共之爭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影響，不能說較其下屬杜聿明更高，但也不至於比杜更低吧！而蔣撤出東北行營的決定，對於蘇聯和中共在東北之所爲還是產生一定影響的。進而言之，國共雙方從統帥部到東北當地所部，即蔣介石——熊式輝——杜聿明和毛澤東——彭眞——林彪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同有異，如果能夠深入論述，或是可以出彩揭秘之處，惜也未在這方面多所著墨。

就譚著的具體內容而言，比較周全的是對中共在東北作爲的敘述和分析。如論及蘇聯軍隊進入東北時帶著中共抗聯人員組成的先遣隊的作用；中共部隊

佔領山海關是出自指揮官的主動性，此乃國民黨方面所欠缺；中共在東北不斷根據情況變化而迅速調整戰略；凡此種種歷史所證實者，都體現了競爭棋局中下好先手的重要性。（第 2 章）譚著還注意到國共軍事爭奪的許多細節，如法庫秀水河子和盤山沙嶺戰鬥（第 4 章）；再如，四平之戰雙方攻防部署及其詳細戰鬥經過（第 5、6 章）；又如，中共方面的四平衛戍司令員馬仁興的作用（第 5 章），這是大陸相關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的人物。作者還利用在四平實地的口述訪問紀錄，敘述了一般民眾對於四平之戰的感受。（第 5 章）

回到譚著起始的問題，國共爭奪中的東北和四平的「決定性」意義究竟何在？譚著認為，歷史學家是善變的評判者，他們的意見經常深受其所處時代和地域的政治環境影響。就四平戰役而言，既是蔣介石失去的機會，同時也是毛澤東得到的機會；對於國共雙方而言，既是戰略轉捩點，也不無戰略失誤。總而言之，對於四平之戰的不同表述，留下了不同的歷史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不僅立基於在四平發生的事實，而且立基於因為那時那地發生的結果，而在後來造成的不同語境中。我們可以「假設」：四平之戰國民黨獲勝後不因停火而乘勝追擊，便可得到「決定性勝利」；但是，歷史不是實驗科學，我們同樣可以對這些「假設」提出合理的質疑，從而推翻其可能性。惟一可知的是，如果想以史為鑒，首先要做的是理解過去實際發生了什麼事。（第 8 章）

依筆者之見，關於國共東北之爭尤其是四平之戰，譚著是一簡明、平實、客觀和成功之作，也相當具有可讀性，既適合學者研究參考，也適合一般人閱讀。至於譚著的看法是否合乎歷史的真相，是否可以為學界和業餘讀者所認同，就在於各自的判斷了。